

议政建言

金融服务“三农”促进可持续发展

全国政协副主席 李金华



近日,安徽亳州市谯城区粮食局“服务三农乡镇行”活动在双沟镇拉开帷幕。图为一位农民高兴地领到国家粮食政策的宣传资料。

张延林摄

破解农村金融难题有路可走

近年来,福建、吉林省农行在服务“三农”和支持中小企业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因地制宜开发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证实了破解农村金融难题并非无路可走。截至2008年末,福建省农行涉农贷款余额为544.7亿元,占全部贷款总量的53.74%,比年初增加59.3亿元,占全部贷款增量的34.38%。2009年年初至3月中旬,吉林省农行新投放涉农贷款31亿元,占全行新增贷款总量的92%。

吉林农行已向农户发行惠农卡70多万张,授信37.7亿元,预计2009年增加发行惠农卡160万张,2010年农户授信总额达到110亿元,占全省县域农户正常生产信贷需求的55%。截至今年2月底,福建农行累计发放惠农卡37.6万张、激活率超过78%,农户小额贷款余额达到1.4亿元。

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三农”和中小企业担保难的问题,福建、吉林农行结合本地特点,推出了“农行+龙头企业+农户”、“农行+信用社+农户”、“农行+合作社+社员”等新型保证担保和贷款方式。

农行通过上述产品和服务模式的创新,把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政村、农户有机地捆绑在一起,促进了农民、龙头企业和银行的多方共赢。

福建、吉林两省农行领导对“三农”工作从试点启动、推进、深化到推广每个阶段都亲自研究、重点部署,选派敢于创新、心系三农的得力干部充实基层服务“三农”队伍。同时,号召全行上下把服务“三农”和县域经济确定为农行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目前已初步寻找了一条以惠农卡为载体,以缓解农民“贷款难”为突破口,以县域规模化融资和中小企业服务为基础,服务到位、风险可控、发展可持续、具有农业银行特色的服务“三农”新路子。

福建、吉林省农行认真贯彻执行总行政策,单独安排县域和“三农”费用,确保对服

务“三农”的支持政策落实到位。福建省农行围绕三农金融部的组织架构、独立核算和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改革,扎实推进服务“三农”工作:着力搭建组织架构和配套体系,充实“三农”板块人员,提升独立核算水平。吉林省农行将服务“三农”营销贷款目标与工资挂钩,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各级行和员工服务“三农”的积极性;同时,精简县域支行内设机构,大力压缩机关中后台人员,充实“三农”客户经理队伍。2009年,还将加大机关人员分流力度,使农户客户经理占县域支行员工的比例达到34%。

解决深层次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福建、吉林省农行转变思想观念,根据农村改革发展需要,初步摸索了一条服务“三农”和中小企业的有效途径,当地农村金融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普遍性和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解决。

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成本高、相对收益低。尽管福建、吉林农行在服务“三农”过程中实现了利息收入的增长,但农村金融与城市金融相比较,仍存在信贷风险成本较高等问题,经营效率还有待提高。如福建省农行“三农”板块信贷成本率1.46%,高于城市板块0.15个百分点,高于全行平均水平0.1个百分点。同时,推广小额信贷,改善惠农卡用卡环境,需要在农村地区投放大量的电子机具和设备,前期投入很大。按一个重点镇布放1台自动存取款机(20万元/台)、5台转账电话(500元/台)的最低服务标准计算,布满全国1887个重点镇仅初期设备投入就需要3.8亿元,每年维护费用约0.4亿元;布满全国3.5万个乡镇共需初期设备投入约70亿元,每年维护费用约7亿元。在目前农村金融资源相对匮乏的情况下,这些设备的使用效率很低,几乎没有经济回报。

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仍未解决,主要问题是担保体系不完善,担保成本过高。目前,中小企业贷款大多通过担保公司担保方式取得,

担保公司担保能力有限、收费高、授信率低,保证金一般也要由贷款企业自己负担一部分,企业经营成本较高。担保公司担保费一般在3%左右,保证金通常由企业缴纳5%,按照现行一年期贷款利率(5.31%)计算,如果贷款利率上浮10%,企业获得资金的综合成本高达9.31%。另外,小企业贷款的核保程序也非常复杂,要求高且效率低,往往错过了企业的资金最佳需求期,中小企业资金缺口仍较大。如2008年度福建省厦门市63家中小企业银行贷款需求20.6亿元得不到满足,漳州市规模较小的企业资金缺口约32.86亿元。

农村金融风险分担、补偿机制不完善。农业是弱势产业,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农户家庭经营规模小、财产少。目前,农业政策性保险发展缓慢,贷款基本上没有保险保障,在银行向农户发放贷款后,农业风险又通过农户贷款传导并聚集到银行身上。一旦遭遇自然灾害及其它突发事件,不仅农户的生产生活将遭遇较大困难,银行也会背上沉重的不良资产包袱。这也导致一些金融机构的基层行不愿和不敢做大这块市场。因此,加快农业政策性保险及建立由政府、民间组织、农户与银行、保险等主体之间合理分担风险的长效机制是下一步农村金融发展的重点之一。

建立长效机制谋求长久发展

目前,农行正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面向“三农”金融服务试点工作,开了个好头,但要谋求全国农村金融长久发展,还需要完善农村金融配套制度,引导全社会形成合力。

认真总结、宣传和推广农行和其他相关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做法和初步经验。福建、吉林两省农行的实践表明,只要理念正确,定位准确,措施得力,工作到位,农村金融可以实现商业可持续发展,面向“三农”与商业运作能够实现有机统一,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能够双赢。建议有关部门认真总结农行近年来服务“三农”的初步经验,分析原因,找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方

核心提示

连续五年中央一号文件都与“三农”有关,其中强调“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三农”问题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已经形成了共识。但是,如何把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切实解决农村金融中存在的问题,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率全国政协视察团赴福建、吉林两省视察调研,就“三农”信贷等有关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视察团认为,从发展趋势看,在广大农村,能把农民带动、凝聚起来的龙头企业至关重要。但目前许多龙头企业和面向农业的中小企业融资比较困难。如果银行能扶持这些企业成长起来,无疑会对加快农业产业化,带动农民致富,增加农民就近就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现将李金华同志的调研报告摘发如下。

法和做法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宣传和推广。

政府在财税、金融政策上要对农村金融予以优惠。由于金融机构服务“三农”效益较低,又面临着一定的经营风险,政府必须建立扶持农村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一是尽快落实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对凡是达到一定支农要求的金融机构,都给予所得税和营业税优惠,至少使其可享受与农村信用社同等的待遇。二是建立对特定信贷业务的专项扶持政策。建议对产粮大县粮农贷款、贫困地区的农户小额贷款给予相应的定向补贴。同时要明确补贴的机制和内容,提高补贴资金的利用效率。三是对涉农贷款占比高的金融机构,适度调低存款准备金率,鼓励其增加涉农贷款投放,实行有差别的风

险问责,呆账核销等监管政策。要充分依靠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三大农村金融力量,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加快解决农村金融发展中突出问题的同时,重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和配置,充分发挥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和农信社在农村现有营业网点多、工作人员对农村金融业务相对熟悉等优势,释放县域支行的经营活力。同时加大对农村金融服务的宣传力度,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同心协力、分工合作的局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之路。

政府要加快建设服务中小企业的担保机制。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可建立由政府出资或多方筹资符合“三农”发展需要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中心或担保公司,带动各种担保机构的发展。同时,扩大有效抵押品的范围,保护担保债权的优先受偿权。

加快农业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应加强农业保险立法,以法律形式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建议开发农业贷款补偿保险品种和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范围,增加补贴品种。同时,完善农业灾害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

调研结晶



重庆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反映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实现自身发展历史的综合性展馆,馆内收藏了八个民主党派先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办公用品、生活用品、书信、手稿等珍贵文物及大量图片资料。图为5月12日,天津市民主党派考察团在重庆市委统战部领导的陪同下参观特园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

本报记者 崔佳摄

“我是大山的儿子,我对山区、对农民有着深深的感情。”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林业厅副厅长吴鸿在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说。

吴鸿出生在浙江东阳的山区农村,他的父母都是山区学校的教师。从上大学到读硕士、博士,他所学习和研究的专业都与农林有关,毕业后他曾在浙江省经济较为落后的山区市——丽水市工作过一段时间,吴鸿说,他生长在山区、工作在山区,他对山区农村的贫困、落后有切身的体会。

“不能治山,就不能治国。”这是吴鸿经常提到的一句话。从1998年当上浙江省政协委员、常委,到2008年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吴鸿关注的目光从没有离开过经济欠发达的山区农村。

我们不能再用“霉干菜”去抚养下一代了

2000年丽水市撤地建市后,吴鸿担任该市九三学社第一任主委。第二年,在他的建议和组织下,九三学社丽水市委邀请浙江大学几位九三学社成员成立了调研组,对当地山区农村的教育状况进行调研。吴鸿至今仍记得,他们在该市莲都区黄村乡中心学校调研时看到的情形——学校的教学用房只有两幢,一幢为泥木结构平房,一幢为二层砖木结构楼房,学生们没有宿舍,只能租住校外民房,一个3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分上下两个大通铺,竟然住了30多名学生,当时正值冬季,房间窗户没有玻璃,只用木条或报纸遮挡。吴鸿还看到,大部分正处于长身体阶段的山区学生用餐还是以霉干菜为主。

调研组还了解到,山区学校老师的收入很低,但为了不让孩子辍学,几乎每个老师都帮助过上不起学的孩子交学费。“我父母当老师的时候就经常帮学生交学费,现在的老师还是一样的。师德如山啊!”吴鸿不止一次地为山区教师崇高的品德所感动。

怀着对山区学生和老师的崇高敬意,调研组成员撰写了一份详实的调研报告,并递交给省委、省政府,呼吁加大欠发达地区义务教育扶持力度,使经济落后地区的孩子也能平等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看到这份调研报告后很是动容,当即批示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要重视研究解决山区的教育问题。“很快,省财政就拨款80万元为黄村乡中心学校建了学生宿舍。随后,浙江省针对解决欠发达地区教育问题又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现在国家更是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并减免了中小

奔小康不能忘了“老、少、边、穷”地区

由于工作原因,吴鸿经常下乡,目睹的山区农村现状令他很忧心。“有的地方农民生活很苦”,吴鸿看到,在山区,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那些老人、孩子,很多人家住的还是土坯房,山区的交通状况很差,很多村庄没有路,车子根本开不进去。

“作为政协委员,我认为我有责任为山区人民做点事。”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吴鸿走乡村、访农户,边工作、边调研,了解了大量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现状。2003年初,在省政协全会上他提交了《加快欠发达地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提案,呼吁奔小康不能忘了“老、少、边、穷”的偏远山区。该提案被省政协列为当年重点提案。

吴鸿认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永恒的主题。浙江省区域经济发展还不够平衡,以丽水、衢州两市为重点的25个欠发达的县(市、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国内外的经验教训表明,区域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如何抑制地区差距扩大,从而维持必要的区际公平?首要的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强有力的“手”调控“看不见的手”,通过转移支付等倾斜政策积极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大力提供诸如基础设施、科技教育、公共卫生、生态补偿以及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增强其对发达地区经济能量辐射的吸收、消化和利用的能力。

吴鸿的提案受到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作为提案的主办单位,省农办主要领导多次深入丽水、衢州、武义、缙云、云和等欠发达地区开展专题调查,重点研究加快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措施。

近几年来,浙江省不断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相继启动实施的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百亿元帮扶致富等工程,取得明显成效,政策倾斜优势为欠发达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关注浙江山区到关注全国山区

被推荐为全国政协委员后,吴鸿仍心系山区。在刚刚结束的今年全国两会上,他提出了“加强山区研究,加快山区立法”这样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建议,站在更高的层次上为大力促进我国山区的可持续发展建言。

吴鸿委员认为,山区独具人文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但也是一个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而中国山地问题是个综合性问题,其研究亟待加强系统性、综合性。应把山地研究和山区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区是主要的生态源和基因库,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命运和未来。”吴鸿建议,目前,从国际上看,山区可持续发展立法是一个新动向,我国应该与国际社会一起加入到山区发展和保护的行动中,可先在国家政策和环境法中增加山区发展与保护的内容,然后通过一部适应山区实际情况的综合性法律——《山区法》,使山区政策和法律良性互动发展,促进我国山区的综合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山区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农村人才。为此,吴鸿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上。“现在,留在农村的青壮年少之又少,要搞新农村建设,靠老人和小孩是肯定不行的。现代化农业和新农村建设需要注入新鲜血液,需要新一代‘农民大学生’。”

情怀

政协委员吴鸿的农村情

毛立军

他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大山